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WenXianXue Yu WenXian FuWu

文献学与文献服务

陈力/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文献学与文献服务

陈 力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与文献服务/陈力著.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47 - 7

I. 文… II. 陈… III. ①文献学—文集②图书馆工作—情报
服务—文集 IV. G256 - 53 G2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544 号

书名 文献学与文献服务

著者 陈力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47 - 7/G · 756

定价 48.00 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 主编:** 吴慰慈 陈源蒸
- 编委:** 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研究馆员, 博士生导师
- 倪 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引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就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1)
今本《竹书纪年》研究	(18)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	(38)
《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	(50)
《红楼梦》东观阁本再考	(58)
《金川纪略》及其相关问题	(74)
新出《钦定皇舆全览》记	(82)
西晋灭吴时日考异并中华版《晋书》校勘体例商兑	(86)
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	(91)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序	(106)
《图说中国印刷史》书评	(109)
公共服务中的图书馆服务	(114)
纸本期刊与电子期刊: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二难选择	(131)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刍议	
——兼论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	(141)
论数字图书馆的多元化资源建设	(153)
Google 与图书馆	(163)
“开放存取”刍论	(167)
电子书的类型与评估	(180)
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	(189)
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再思考	(199)
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和服务	
——从《国家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修订谈起	(212)

关于电子期刊发展问题的思考	
——在电子期刊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219)
数字时代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223)
开创中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合作的新时代	
——中美第四届合作会议主旨报告	(237)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其中古籍辨伪学尤为突出,争议最多,格局变化最巨。审视整个 20 世纪的古籍辨伪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 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古籍辨伪之风最盛,古籍也越辨越伪;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古籍考辨之学复炽,然古籍越辨越真。从表面上看,这种前后变化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一大批青铜器和战国秦汉简策与帛书陆续出土,许多从前被认定为“伪书”的文献找到了更为古老的来源与根据,过去被判为“伪书”的证据一个一个被攻破。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有了新的资料为一些上古文献提供了真确的依据,而在于过去判定它们为伪书的方法与理论本身就需要认真地加以检讨。

1

一、古籍辨伪学的概念

直到现在,“古籍辨伪”这个概念都是相当含混的。

顾名思义,所谓“古籍辨伪”就是对古籍真伪的审查。但是,“真”与“伪”都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古籍的实际情况是,“真”与“伪”是相对的,所涉及的面,也是比较广的。

古籍的“真”“伪”,有作者的问题,有成书年代的问题,有内容的问题,还有“真”与“伪”的程度问题。或者作者伪,而成书年代不伪;或作者与成书年代不伪,但经过长期流传,内容已非原貌。就程度而言,有小部分伪,有大部分伪,也有全伪。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作者的问题为例,张心澂在其著名的《伪书通考》里也提到了古书的作者问题有四种情形,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判别真伪

的标准。他认为：一、“古人不自著书”，如谓《管子》为管子一派人所作，则不伪；如“题为管夷吾所著，则成伪书矣”。二、“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因此常无作者名，如果这类书题“文王作，周公作，孔子作，曾子作，一人题名，遂成定案，致使后人翻案，发生辨伪之事”。三、“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如《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司马迁谓为左丘明著，于是就成了问题。四、“书名非著者之名”，如《荀子》、《管子》皆书名，如谓作者为荀子、管子，也成了问题。^①

上述张心澂先生提到的四种情况在古书中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但问题在于，一部书中，作者只是该书所含众多信息的一个单元、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是否可以将作者之伪与古书之伪等同起来？并且这个所谓的“作者之伪”，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后世的改编、传抄、重刻者“强加”给古书的，并非古书的初编者所定，如果将局部问题与全局问题等量齐观，恐怕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书都将被打入“伪书”之列，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同时代古书的特点是很不相同的，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就曾指出：

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②

对于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古书，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统一、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判定其真伪？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由于古籍“真”“伪”标准难于统一，使得“古籍辨伪”的概念相当模糊。同时，从古籍辨伪的历史来看，它依傍经学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籍辨伪常常是经学的附庸，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今、古文经纷争的烙印。加上各人的着眼点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因此对文献的认识也各有差异，虽然如清代乾嘉学者力图使古籍辨伪更具客观性，但最终对 20 世纪古籍辨伪影响最大的还是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20 世纪的疑古思潮，也

是在康有为等人疑古惑经思想的启发下发生的^③。可以这样说，古籍辨伪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门颇具主观色彩的学问。

在古籍的辨伪方法方面，古籍辨伪从汉代开始，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其研究的方法也在逐步完备，北魏颜之推，唐代刘知几、柳宗元，宋代吴棫、郑樵、朱熹，元代吴澄、明代宋濂、梅鷟等等对古籍辨伪的方法都曾有所论及，或者进行过古籍考辨的实践，但真正对古籍辨伪方法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明末学者胡应麟，其《四部正讹》论辨伪之法云：

凡覈伪书之道，覈之《七略》以观其源；覈之群志以观其绪；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覈之文以观其体；覈之事以观其时；覈之撰者以观其託；覈之传者以观其人。覈兹八者，而古今膺籍亡隐情矣。^④

胡氏所论，涉及到了古籍流传、文字内容、时代特征、著者与传者等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辨伪学理论，故梁启超先生谓其书为“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⑤。

有清一代，文献的考辨为当时学术的主流，涌现了一大批以文献考据著称的学者，如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姚际恒、钱大昕、崔述、姚振宗等等，考辨的成果超出了以往，但在考辨方法上并无大的突破。真正使古籍辨伪从方法和理论上获得突破的还是在20世纪。

20世纪上半叶在古籍考辨方面用力最多、成就最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梁启超、王国维和顾颉刚先生。

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三位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王国维和顾颉刚二位先生，虽然顾颉刚先生对王国维先生极为仰慕，甚至梦想与他“携手而行”^⑥，但无论是在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著作中还是在他的直接表述中，都显示他与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并不同调。有趣的是，除了梁启超与疑古学派有着今文经学这一点共同的思想渊源外，三位在治学方法有很大差异的学者在古籍辨伪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梁启超与王国维先生都曾经对“今本《纪年》”给予过高度的重视，在梁启超先生的著作中，这书是被当作伪书

的典型而加以剖析的,而王国维先生更撰有《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并成为20世纪古籍辨伪学的典范。顾颉刚先生则更进了一步,所怀疑与否定者,远迈梁、王。因此,要对20世纪上半叶古籍辨伪工作进行分析与评价,必须从这三位20世纪学界巨人的古籍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分析着手。

二、梁启超先生的古籍辨伪方法评议

梁启超先生不仅是近代史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古籍辨伪的宣传者与实践者,同时还是传统辨伪方法的总结者。1922年,梁启超先生正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7年发表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对古籍辨伪的重要性与方法进行了论述。

什么是伪书?伪书有哪几种情况?梁启超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一章中归纳了十种情况:

- 一、为全部伪;
- 二、一部伪;
- 三、本无其书而伪;
- 四、曾有其书,因佚而伪;
- 五、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 六、内容不尽伪,而书人名名皆伪;
- 七、内容及书名不伪而人名伪;
- 八、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 九、伪后出伪;
- 十、伪中益伪。

换言之,凡有以上十类问题的图书皆可入“伪书”之列。按照这个标准,在传世先秦两汉文献中,不是“伪书”的大概就没有几种了,就连《论语》、《史记》等等都包括在内,因此梁先生也不禁感慨道:“中国的伪书,真是多极了!”^⑦

在辨伪方法上,梁启超先生在总结前人特别是胡应麟辨伪方法的基础上,将古籍辨伪的方法归纳为两方面,即:从传授统绪上和文义内容上辨别。如何从传授统绪上辨别?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八种办法:

- 一、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
- 二、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
- 三、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
- 四、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
- 五、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
- 六、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
- 七、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
- 八、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

如何从文义内容上来辨别? 梁启超先生提出了“五大法门”:

- 一、从字句缺漏处辨别(如从人的称谓上辨别、从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来辨别、从后代的事实或法制来辨别等等);
- 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
- 三、从佚文上辨别;
- 四、从文章上辨别(如从名词、文体、文法、音韵等等);
- 五、从思想上辨别(如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⑤)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对古籍的辨伪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尤其对梁启超先生从文义内容上辨别伪书的“五大法门”极为推崇。除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之法进行了专门论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还提出了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

较之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梁启超先生的辨伪方法无疑要全面得多,因此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在古籍的考辨中被广泛应用。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先生上述的辨伪方法是有许多问题的,例如梁启超先生提出的从传授统绪上辨别的八种方法没有一种是绝对的,而所谓“五大法门”也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只能作为我们分析古籍时的一种参考。瑞典

学者高本汉先生早在 30 年代就对梁启超先生提出的辨伪方法以及当时人们采用的其他一些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批判,指出,当时学者们经常采用的一些辨伪方法要么是不能成立的,要么是必须有条件的限制性使用。高本汉就此提出了 9 个方面的问题:

(1) 根据书中所述史事的年代与作者的年代不符,仅能证明所讨论的一段而不是全书的年代,因为如果只有一处时代不符,有可能是后来竄入的,但一书中有好几处这样的错误,那就算是伪作的铁证了。

(2)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有可能有部分亡佚,因此如古书所引而今本所无,并不能证明今本为伪。

(3) 以书的内容“浅陋”而判其为伪书,这是一种错误的标准,“现在正应该从真伪的讨论里除去这种标准”。

(4) 以书的文体“不古”而判其为伪书,“这条理论差不多与上条是同样的不谨严,但是常常会遇到的”,“应完全取消”。

(5) 即或一书“后代编者或注者所述作者事迹被证明为假的”,也不能判定其为伪书,因为书的本身与编者或注者的事迹并无直接与必然的关系,这并不影响书本身的价值。

(6) 偶有书志不载,并不足以证明此书为伪。

(7) 一书之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并不能作为其伪或可疑的证据,因为“重编与割裂篇卷实在没有什么奇怪而且有些古书(例如《史记》)一篇有时是两三百页,有时是二三十页,所以更没有什么奇怪。那么,古书目里卷数篇数自然是个很危险的标准,只能在绝对厉害的地方可应用”。

(8) 以某书引用了一个已经证明为伪的书而判其书为伪书,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心思细密的人马上要问:我们怎样知道事情不刚刚相反:乙书伪造者在造伪乙书时引用了真的甲书”。

(9) 如果一部书中有几段同时见于他书,由此而证明其书为伪,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前人援引古书,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如(甲)依样抄用,一点不改。在这种方法之下,又有两种情形:一、引用的文字风格与自己的著作大异,使人立刻就可以知道是借用的;二、引用的文字风格与自己的著作并无二致,因此不能判定二

者孰早孰晚；(乙)各处改动,使之不易被察觉孰早孰晚；(丙)意译一下,使其易读。在这三种援引古书的方法中,只有甲一和丙种方法可以用作辨真伪的证据,而甲二与乙,是不能用作辨伪的证据的。高本汉进一步指出:“也许有人说若能证实一部书有几段与一群古书相同,其形式虽是属于甲二及乙的,也可断此书是晚出的伪作。不幸这也是个错误的标准,因为晚周与秦代有许多公有的传说,任何作者都可自由引用,大都不说明来源。对于这时期的许多书也如此:无论你拿起什么书,你总会找到几段与同时的两三种书相同。在任何一段里,要决定孰早孰晚,几乎大都是绝望的。而且他们的原本,有几处是显然已亡佚了的。”^⑧

我们认为,高本汉的上述意见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代文献的实际情况的。不幸的是,高本汉关于传统的古籍辨伪方法的批评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他自己提出的根据文献的文法系统来判定文献时代的方法得到了一些反响。

三、王国维先生《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与古籍辨伪

如果说20世纪在辨伪方法的总结方面梁启超先生影响最大,那么在具体的古籍辨伪实践方面影响最大的就应该是王国维先生了。

王国维先生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曾是20世纪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古籍辨伪的经典之作。王国维先生选择“今本《竹书纪年》(以下一般简称《纪年》)”作研究,大概不仅因为这是一部所题年代最早、系统最完整的上古史编年著作,也是自清代以来在古籍考辨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部文献,信“今本”者代有其人,如顾炎武、陈逢衡、雷学淇等;非“今本”者亦代有其人,如钱大昕^⑩、崔述^⑪、姚振宗^⑫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

非“今本《纪年》”者,其论证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今本《纪年》”的传授统绪、“今本《纪年》”的体例、内容与古书所引《纪年》文特别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和《晋书·束皙传》关于《纪年》记述之间的差异等方面,可以说,几乎涉及到了胡应麟和梁启超先生总结的各种辨伪方法。根据诸家之说,“今本《纪年》”已非汲冢之旧,实为后人所辑,姚振宗更直指为明嘉靖中天

一阁主人范钦伪造。清人朱右曾广辑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纪年》文,汇为一编,名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明代所传《纪年》本相区别,后世遂称明代以来的传本为“今本”,而从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纪年》文字为“古本”。

在钱大昕、崔述等人考证的基础上,王国维先生对“今本《纪年》”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考辨,谓“今本《纪年》”“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直欲弃之毁之而不惜^⑧。

但是,仔细分析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方法与结论,我们认为许多地方都是值得商榷的。

王国维先生所用的考证方法,据其序称,乃清代阎若璩、惠栋、孙志祖等考辨《尚书》、《孔子家语》之法,即将“今本《纪年》”所自出,一一指明,即所谓“犹捕盗者之获得真赃”之法。应该承认,这固然是一种可以采用的考辨方法,但不可绝对化,道理很简单,此本有与彼本内容相同者,也许它们有共同的来源,也许是此本抄彼本,但也有可能是彼本抄此本。清初阎若璩曾以此法论证《大禹谟》之关键“人心道心”出于《荀子》一书时,毛奇龄就曾反驳说:

且人心道心虽《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经》文,不是《经》文引《荀子》。^⑨

王国维先生《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所采用的资料大都摘自清人陈逢衡的《竹书纪年集证》,而在《竹书纪年集证》中,这些资料恰恰又是被陈逢衡用来论证今本《纪年》史料价值的依据。

此外,王国维先生的考证还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将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纪年》文字与“今本《纪年》”进行比较,发现问题即指为“今本《纪年》”为后人伪造之证据。一方面,其选择与“今本《纪年》”作比较的标本——“古本《纪年》”本身就有问题,用一个本身就有问题的东西作为判断“今本《纪年》”真伪的标本,显然是不妥的。

第二,由于对“古本《纪年》”还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如果对古书所引《纪年》文字不能基于正确的理解而将其作为判断“今本《纪年》”真伪的标准,同样是不妥的。

第三,忽略了古籍的成书与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古籍的内容必然会在其成书与流传的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有“同情之理解”,难免会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西晋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盗发界内古冢,获古书简策凡数十车。经过整理,得书七十五篇,《竹书纪年》十三篇即其中最重要者。当《纪年》出于汲冢时,“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阙”^⑮，“文既残缺,不复论次”^⑯。兼之汲简原以“古文”写就,西晋学者在整理时对其文字“已不能尽识”^⑰,虽迭经整理,但当时学者对于整理本的文字内容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晋书·束皙传》谓“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晋书·王接传》则云:“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对汲简的反复讨论商榷,说明在汲简出土之初,学者们对简策的编排、文字的隶定、内容的增删等等都有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后人忽略的问题,即由于汲冢原简出土时已经非常淆乱,对于残缺不全、次序错乱的简策的整理复原,必然会建立在整理者对古史固有认识的基础之上。不同的整理者由于经学观点不同、对古代历史的看法不同,整理的结果自然也就各不相同。据夏含夷先生研究,西周初年周王的在位年数,就曾根据一些传统说法结合汲冢竹简的一些关键年数,对武王的年数进行了重排。^⑱

“今”、“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商、西周年代的记述历来就是古史界最为关注的部分,也是学者们研究“今本《纪年》”真伪问题的一个关键。我们也可以以此为例,来分析以往古籍辨伪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等所引《纪年》云: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⑲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⑳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㉑

从字面上看,“今本《纪年》”所记三代年数与《史记集解》所引是有差别的,“今本《纪年》”记夏禹即位之年当公元前 1989 年,至公元前 1559 年为商汤所灭,其间共计 431 年;商汤即位之年当公